



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文库·高宣扬作品系列

当代法国思想 五十年

(第2版)

·上册·

高宣扬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第2版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洲生命哲学的新发展研究”（批准号14ZDB018）的部分成果

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文库·高宣扬作品系列

当代法国思想 五十年

（第2版）

·上册·

高宣扬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代自序：在哲学与非哲学中迂回

我的哲学生涯，就是我个人的整个生命历程。生活使我喜欢哲学，哲学使我懂得了生活；浪迹天涯的生活历练以及惊涛骇浪的“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又加深了我对哲学的理解，并时时推进我的思想情感，穿越人文社会科学及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通过在各种文本中的循环迂回反思，试图探索生命的奥秘。从十五岁到今天，整整半个世纪的岁月，在国内外颠沛流离的游牧生活命运，我始终同哲学打交道，并在同哲学的交往中，不断地改变对哲学的看法，而我的命运本身，也渗透着哲学的神秘力量，使我品尝了生命过程的酸甜苦辣滋味。哲学作为生存的一种实践智慧，以其对生命本身的关照和澄明，见证了它无愧是生命的灵魂。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哲学无非是一种无止境的感恩和怀念。当尼采在晚年穿透历史而发出“重估一切价值”的豪迈口号时，他仍然以感恩的心情，由衷地称叔本华为他的最早的“教育者”（als Erzieher）（参见尼采 *Unzeitgemäße Betrachtungen*, 1873—1876），从而一览无余地展现出尼采的“永恒回归”的广阔理论视野。

在我的哲学生涯中，时时伴随我思想脉动的内在力量，来自我生命历程中的各种遭遇。而在我所遭遇的关键人物当中，与我的生命融为一体的，就是五个人：我的母亲、毛泽东、马克思、康德和尼采。他们分别地出现在我生命转折的不同时期，使我在亲身经历的不同的生活时空中，从出生入死、苦乐交替的动荡不定生活和深沉反思中，懂得了哲学与生存之间的血肉交融关系，体会到哲学的开放性及其在人生历程、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领域中进行流连忘返的极端重要性。

1939年初，在阴历虎年岁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火声中，我出生在一个漂泊海外多年的华侨教师家庭。我的父母靠他们所获得的暨南大学和杭州女子师范学校的文凭，四十多年如一日，始终任教于华侨教育界。他们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不动产，永远都以任教的学校为家。如同萨特从小就

在其外祖父的带领下看书一样，我也从懂事的时候起，就在身为华侨学校教师的父母的教导下，培养出以看书写字为乐的生活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说，父母不但给了我肉体生命，尤其还赋予我精神生命和哲学灵魂。

打从童年时代起，每当夜幕降临，我就偎依在母亲身边，陪同她批改学生作业，殷切期盼她在夜深人静、改完学生作业之后，字字句句带我习读动人的神话。妈妈耐心地指导我看书，并在阅读中，启发我敞开想象的大门，训练我最初的超越现实的能力，还教我学会查《王云五四角号码字典》和看地图。爸爸则几乎天天在晚饭后的散步中，向我讲述一个又一个动人的历史故事，并严厉地要求我熟背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试图让我从人类经验中，体验人生的艺术。从此，查字典和看地图，成为童年时代最吸引我的游戏活动；学校图书馆和挂在教室墙上的各种大地图，也成为我的玩伴和游戏场所。每当我在字典里亲自发现一个新词汇，认出一个新国家、河流、山脉或港口，就喜出望外地向妈妈报告，于是，妈妈就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由此，我慢慢地懂得了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生活道理：以寻求智慧的好奇，扩大自己的人生视野，是真正回报母爱的最好途径，也是享尽令人陶醉的人生饕宴的珍贵机遇。

七岁那年，妈妈教我从头到尾系统地看书的最初读本，是当时学校图书馆藏的《苦儿努力记》和《岳传》。前一本是法国作家马洛（Hector Malot）所写的 *Sans famille*（原文直译为《无家可归》）的中文译本，为中国作家夏丏尊所译；后一本是属于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历史普及丛书。这两本书所散发出来的精神魔力，对我的思想和生命成长的影响是如此深远，它们不仅一直伴随着我的心灵成长过程，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可以说，它们不折不扣地成为我一生命运的镜子和缩影：我本人所经受的大跨度时空变迁，大起大落，以及一切令人刻骨铭心的生活煎熬和情感震荡，都活生生地重演了两本书的情节。

当我第一次阅读《苦儿努力记》时，首先使我佩服的，是译者夏丏尊先生：他竟把原来法文的著作流畅地译成中文！我当时就暗自立志，长大后要像他那样，成为懂得多国语言的作家。事隔三十一年之后，1978年，我移居法国巴黎，竟然在巴黎地铁网上，找到了《苦儿努力记》所提到过的巴黎东南郊城镇 Boissy-Saint Léger。我兴奋地多次访问这座城镇，东张西望试图发现小说主人公雷米（Rémy）随同抚养他的民间杂艺表演老艺人的历史踪迹。

以后，我又特地两次到《苦儿努力记》所讲述的法国东南弗朗斯孔泰（Franche-Comté）地区度假，来往于瑞士和法国边界，抱着缅怀、同情和鉴赏的态度，反复沉思流浪儿雷米当时徒步穿越这一地区山川大地的哲学意义，因为我已经从我个人亲身经历的哲学炼狱与人生沧桑沉浮的过程中，体会到我同雷米一样，不由自主地在不同舞台上，演出了类似的充满戏剧性的游牧生活遭遇。同样地，《岳传》给予我的爱国主义精神，后来一直成为我的不可磨灭的情结之一，每当世界上发生重大事件，不管我身在海外何处，也不管我在地球的哪个角落，这一情结如同一股神秘不可测的力量，影响着我的思路和情绪的起伏；而岳飞晚年遭受陷害的悲剧，也在“文化大革命”对我的“隔离审查”和一再地“批斗”中，活灵活现地重演着：人们当时竟然对我的华侨爱国之心，抱着怀疑、鄙视，甚至嘲弄否弃的态度！

这一切，就是我的哲学思想的基础和起点。随后，即使哲学把我带到古希腊、古罗马或古典时期的德国以及当代法国，都脱离不开少年时期母爱和母文化对我的熏陶；同样也无法抚平被残酷无情的现实生活所刻烙留下的沉痛创伤，它们时时申饬着我的心灵，根深蒂固，挥之不去，并以顽强的精神，渗透到我所吸收的一切文化当中；反过来，我的喜怒哀乐情感越是起伏不平，面临的新鲜文化越是层出不穷，我对生活和哲学的“流浪”、“迂回”、“永恒轮回”的性质，就感受得越深。

1952年，十三岁，是《岳传》所传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我决定离开在印尼的温暖家庭，只身归国求学，并选择享有“老革命根据地”荣誉的东北，作为我在祖国的落脚点。从热带零上二十多度的印尼到北温带寒冬零下二十度，从天天吃大米到顿顿吃高粱和窝窝头，不但没有使我对自己的选择有所悔恨，反而更加深了参与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的决心。

正是在东北，我在母文化的基础上，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同时又大量地阅读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使我从十三岁到十五岁的少年青春期中，被丰富的人类文化遗产所充实。在此基础上，十五岁那年，高中一年级，第一次阅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成为我的处女哲学读物。

毛泽东教给了我第一个哲学概念：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高理论总结。这个哲学定义长久地指导我的人生观和哲学立场，促使我在十八岁

高中毕业时，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把研究哲学当成我的终身第一志愿。为此，我要永远感恩和怀念毛泽东。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和康德先后激发和加深了我对哲学的理解。确切地说，在大学和研究生时期，我首先是以毛泽东的哲学定义解读马克思和康德。接着，马克思的哲学让我进一步学会将人的激情与哲学的反思结合起来，使辩证法的精神与生活的逻辑扭结合一，以大无畏的探索实践，寻求自然、社会和生活的真理。到了研究生阶段，在我的导师郑昕教授的亲自指导下，我用了三年半的时间，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及《判断力批判》三大著作，给了我关于人的认识、道德和审美三大基本能力的教育，让我领悟到“人作为目的自身”的最高尊严；同时也明白了人的理性及其界限，启发我要善于在生活中，依据具体情况，独立自主但又恰如其分地使用自己的理性。

1966年春天，我手持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文凭，到中国科学院报到工作，但迎接我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这时，也只有这时，我对毛泽东、马克思和康德的哲学理解，才真正地受到了检验，我也受到了终生难忘的哲学教育。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个人的和亿万人的历史实践，像火焰翻滚的熔炉，融化掉一切虚幻的理念和天真的情怀。我的个人命运同无情的权力争斗、亿万人的生离死别铰链在一起。这是我一生中最悲惨，但又最丰富、最珍贵、独一无二的经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虽然身在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基地的北大哲学系，但我始终得不到机会认真系统地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文化大革命”对我长达八年的“隔离审查”，在门窗紧闭、暗无天日的戒备森严的环境中，我反倒获得了机会，让我反复阅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大卷及《资本论》三大卷。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反复穿越毛泽东和马克思本人的文本的字里行间中，感受到思想、语言论述、历史、生活逻辑、生命情感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神秘交错结构；同时，人类社会也以最典型的形态，暴露出它的正反两面性；历史的悲剧与喜剧，特别是迄今为止人们试图千方百计加以掩盖的那些最丑陋、最肮脏、最虚伪的正式情节，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都赤裸裸地同时生动地上演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历史浩劫，又是人性和兽性联合

同场演出的历史狂欢节。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获得的生存实践智慧，比我在任何时候所累积的经验都更深地扎根于灵魂的核心中，时时牵动着我的哲学思路。后来，即使到巴黎或台北，“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经常从无意识的底层冒现出来，影响着我对世界和哲学的看法。

从1978年离开中国大陆以来，我先后在香港地区、法国和台湾地区居住，也多次横渡过大西洋和太平洋，足迹遍布欧、亚、美。同我的生活经历一样，我的哲学研究领域，涉及存在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等。其实，我的学术领域的转移，同以往亲身经历的生活历程一样，一方面并非单向性和一次性的，而是循环的和重复的；另一方面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因为它是由三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的。首先是我的哲学研究本身，由于我对哲学持有开放的态度，促使我不由自主地从一个领域走到另一个领域；其次，思考本身的无形力量，特别是其中来自生命活动本身的非理性的情感和意志力量，超出我的主体意识，推动我不断越出学科的界限，不仅在不同哲学派别的文本中间穿梭，也深入到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理论等方面，试图在多向和多维的时空中，寻求新的自由可能性；最后，当代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变革和不断转向过程，也引导我不断突破原有的范围。

在法国的二十五年，当代法国哲学家不断逾越传统哲学的边界，并与多学科的人文社会科学及文学艺术进行无拘无束的对话式的创新过程，使我心花怒放，带领我跨入无限自由的哲学新天地。

从1978年起，历经颠沛漂泊而进入“不惑之年”的我，终于领会到尼采为什么要以“超人”（der Übermensch）的激情，宣告人的生存的“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的本质。“文化大革命”所刻印的伤痕，早已见证了尼采的论断。其实，要真正实现康德所说的“作为目的自身”的人的最高尊严，不仅要靠理性和仁慈善心，而且还要凭借超人的权力意志及灵活机动的生存艺术策略，以鉴赏人生艺术的豪迈态度，敢于面对和逾越一切障碍和界限，大无畏地迎接人生的暴风骤雨，向一切“不可能”挑战，时时超越实际生活的范围，开辟新的生命境界。不能只是从“权力”和“意志”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尼采的哲学。权力意志是一种永不满足、永远自我更新、自我充实、自我扩大的逾越欲望，是彻底摆脱自然状态的、真正的人的永不

枯竭的生活动力，又是具有最高尊严的人，历练人生的纵横驰骋，泰然自若地出生入死，精通生死艺术，确信自己将“同这太阳、同这地球、同这雄鹰、同这条蛇一样”，“永恒地回归到同一个自身的生命”的崇高情操。人是在不断创造中实现自由超越的特殊生命体。哲学家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真正地将自身的思想同生活情感、同人类历史、同他人的各种文本连成一片。

实际上，没有一种真正的哲学思维是可以脱离实际的生命情感的。思维并不是只发生在某个孤立的主体意识之中；没有生活激情的思想是死板的，不同他人的文本进行来回交往的思索是贫乏的。在真正的哲学思考中，如同生活本身，理性、意识、情感、意志、欲望以及无意识等复杂因素，甚至包含一些无法说出、难于确定、不可预测的神秘力量，永远都混合在一起，而且也紧密地同思考者本身的生命律动及其生活世界相交错。哲学只有在同非哲学的比较、交往和对话中才能存在。哲学所追求的思想自由，使它本身无止境地进行自我超越和超越一切。

然而，超越本身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超越”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永不停静，更不归结为胡作非为。超越过程，包含了生活中必要的平静和节制，集中了生活和思维的艺术性。在我最近研究的福柯的生存美学中，我再次感受到超越过程的审美意义。

在出国流浪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我通过穿越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各个领域的文本的迂回，在陆续总结生活经验和哲学思考心得的过程中，撰写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实用主义和语用论》、《罗素哲学概论》、《弗洛伊德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论》、《解释学简论》、《德国哲学的发展》、《罗素传》、《毕加索传》、《萨特传》、《利科的反思诠释学》、《布尔迪厄》、《鲁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流行文化社会学》、《当代社会理论》、《论后现代艺术的不确定性》、《后现代论》、《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当代法国哲学导论》及《福柯的生存美学》等二十五本专著。由五百余万字所交织而成的文本，并不全是我本人所要说出的话语，因为生活和哲学思考所经受的体验和其中的情感，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如实地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重要的是它们毕竟以折射镜的方式，表现了我的生命律动和情感。但是，问题还不仅仅是这些书同我个人之间的关系。更具有本质意义的，在于它们是“他人”的文本的交响乐似的回音，隐含着

现实与历史、过去与未来、生与死、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永恒回归历程的和声。它们还不仅仅在形式上，更在内容方面，体现了生活和哲学生涯的流浪特质。

今后，只要我一息尚存，我绝不会放下笔，要不停顿地继续在广阔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文本间进行游泳穿梭。哲学没有界限，也不应该有终点；它同生命之间的永恒回归，正是哲学本身无可逃脱的命运及其生命力的源泉。

高宣扬谨识

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

第2版前言

阿兰·巴迪欧，当代非常活跃的法国思想家曾经说：任何思想创造都是一场值得庆幸的“事件”，因为它们的发生，总是把不知不觉地积累于历史运作中的创造力量，通过个别思想家的创造火星突然地点燃起来，造成震撼社会和文化生活的精神原子弹。事实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末，又经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法国思想界的无形精神原子弹，远远地超出物质原子弹的有形威力，一再地成为影响全球的历史事件。

思想创造不是封闭的，而是在与他人、历史和文本的反复对话中实现。本书作者历经三十多年在法国实地调查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末亲临法国思想前沿开始，就感受到当时当地思想创造活跃气氛的感染和熏陶。此书从原稿到首次于2002年在港台出版，经历了与德里达、列维-斯特劳斯、布尔迪厄、德勒兹和利科等人的多次交流对话以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多次讨论，反复修改充实，不但试图总结个人在不同时期的心路历程，也吸收对话各方的观点和建议，使本书成为活生生的思想交流的见证，也可以成为今后持续展开的反思研究的新起点。

本书在2005年底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第一版，是在港台繁体字版基础上更新的产物。现在，又经历十年光景，法国思想界一再发生创新事件，在上一代思想家逐个离世的同时，又有成批新型思想家，以新世纪的创作风格，创建独特的新思想登上时代的前沿。因此，本书的再版不但是在预料之中，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的杨宗元主任及符爱霞女士，为本书的再版给予充分的支持和真诚的帮助。

高宣扬

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

2016年元旦

对于一位法国人来说，获悉中国公众从此将拥有一幅关于法国当代思想的宽广画卷，该是多么高兴！这幅画，除了高教授，再也找不到其他任何人，可以比他更好地描绘出来；他在近几十年来，生活在法国，积极地参加各种最重要的研讨会、学术会议和代表大会，还密切注意法国书籍、杂志和期刊的出版状况，并会见过许多法国名流，同他们对话；与此同时，更不用说，他还向法国人介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为了这部经长期努力而出版的著作，请允许我表达热诚的谢意！

高教授以其周密的洞见，将最近五十年呈现为一个整体；这一整体，并不是人为地勾画出来，而是由实际的历史自发地构成。关于精神活动，最好不要过于严谨地划定日期。在各个学科的平行发展中，在各种不同的、然而由于具有共同方向的内容而相互联系的各种著作之间，往往滑行着或多或少比较明显的时间差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 20 世纪末之间所展现的这个时期，尽管有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产品，但确实形成了一个可证实的同一整体。走出第二个千禧年，并不仅仅标志着一个年代上的分段；通过斯大林主义在东欧的崩溃，美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的确立，中国令人印象深刻地发展成为强大而又有威望的国家，以及与此同时，亚洲的尊严普遍地受到确认，所有这一切，使人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里程碑式的断裂。

在两个时段之间所发生的这些实际演化、进步和倒退，在法国思想的镜面上，往往以非常生动活泼，有时忠实，但更经常的，是以折射或变形的方式，反映出来；就好像在其他民族那里，也以另一种方式所做过的那样。法国发展的最清晰的特征，也许就是同过去的文化和思想方面的决裂，或者是在主观意愿上同过去的决裂。而与此同时，以更加善意的态度接受外国的，特别是德国的影响。法国的文化和思想上的往昔成果是非常丰硕的。在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当中，笛卡儿，举例来说，就为观念论提供了新的基础，并使

之同现代科学联系在一起。18世纪清醒的批判和唯物主义，为法国文化铭刻了到处受到称颂和羡慕的、不可磨灭的标记。

当然，这些旧有的成果，在今天并不是完全受到否定。但新的思潮似乎更多地倾向于忘却这些富有盛誉的过去；或甚至对它抱有恨意。在很短时间内，各种各样的理论，突然产生、盛行并消失；它们自诩彻底翻新，狂热地强调并致力于它们的区别性，同时又相互粗暴而激烈地进行争斗。在哲学、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以及精神治疗学等领域，在一种疯狂竞争的环境中，上述各种理论在反对它们的前身过程中成长起来。这就像一种古怪的赛跑，但实际上，真实的情况，往往是在语词的彩漆之下，新鲜的东西比他们所期望的还少，决裂也并不是那么彻底。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各种命运陪伴下，沿着其自身的道路发展的传统基督教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之旁，冒出了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知识论学派和后现代主义。

人们都知道所发生的这一切。所有这些，随着时间流逝，相互评估，也许会出现同样的某些夸张；但以反面的意义来说，它们犹如昙花一现的流行。对于患有特殊疾病的法国来说，文化流行的不停的表演是轻而易举发生的。

接着，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所有这些泡沫般的动荡既然已经缓和下来，法国似乎处在一种欠缺的状态。再也没有新鲜东西！这个国家期待新的英雄们，由他们“鲁莽地”搅动文化舞台，并再次唤醒他们的嗜眠麻木之徒来充当演员。

在世界各地引起那么多反响的这场法国式震荡，还剩下什么？

由于获得确实的和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告知，高宣扬这部书的读者，享有能够客观地从外部对这些丰富内容进行理解和判断的特权。该轮到民族学家们和知识社会学家们，去研究和评价这些民族学和社会学；该由哲学家们去思考这种哲学：以他们依据中国思想精神所形成的标准来判断。他们是否表现严谨？根据科学的公正态度，人们期望这样。

但很了解中国朋友的法国人，知道中国友人会以使法国人经常兴奋的盛誉，使用闪烁的语词和方式，清醒和友善地接纳那些真理的颗粒和有价值的意愿。所以，高宣扬在这里扮演了“说情者”的角色：接受这些知识和反思的灿烂花朵，但不要把它们当做神圣不可触犯的偶像，而是把它们当成某种

珍贵的原始数据，然后，以此为基础，轮到你们自己去加工创造。作出符合明理的选择，使你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产生出新成果吧！

但愿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能以它们本地和合时宜的方式，以历史的节奏，通过它们的奉献，为他者服务。谨此致以同事之情谊！

雅克·董特

法国哲学学会 1980 年至 1990 年主席

普阿济耶大学终身荣誉教授

Avant-propos

Quelle joie, pour un Français, d'apprendre que le public chinois va désormais disposer d'un vaste panorama de la pensée française contemporaine ! Ce tableau ne pouvait être brossé par personne d'autre mieux que par le professeur Khà qui a vécu en France même les dernières décennies, qui a participé activement aux séminaires, aux colloques, aux congrès les plus importants, qui a suivi attentivement la publication des livres et des revues, qui a rencontré les célébrités et dialogué avec elles - sans manquer pour autant, d'ailleurs, de faire connaître réciproquement aux Français la vie intellectuelle chinoise. Qu'il soit chaleureusement remercié pour cette œuvre de longue haleine !

Ces cinquante dernières années s'offraient à son regard aisé comme un ensemble, non pas découpé artificiellement, mais comme spontanément constitué par l'histoire effective. En ce qui concerne l'activité spirituelle, il convient de ne pas fixer trop rigoureusement les dates. Des décalages temporels plus ou moins importants se glissent entre les développements parallèles de disciplines et de travaux divers, pourtant étroitement associés par l'orientation commune de leurs contenus. La période qui s'étend entre la fin de la Deuxième Guerre Mondiale et la fin du deuxième millénaire, forme bien une unité identifiable, malgré la grande variété de ses productions en tous genres. L'issue du deuxième millénaire ne marque pas seulement une fragmentation chronologique : elle impose une rupture événementielle décisive, avec l'effondrement du stalinisme dans l'Est européen, la confirmation de la domination économique et militaire des U.S.A. dans une grande partie du monde, l'impressionnante montée en puissance et en prestige de la Chine et, conjointement, la reconnaissance universelle de la dignité de l'Asie.

Les évolutions réelles, les progrès et les régressions survenus

entre ces deux limites se reflètent d'une manière très vivante, parfois fidèle, mais le plus souvent refractée et déformée dans le miroir de la pensée française, comme ils le font aussi, autrement, dans la conscience des autres nations. Ce qui singularise peut-être le plus nettement les développements français, c'est leur rupture, ou en tout cas leur volonté subjective de rupture avec le passé intellectuel de ce pays, et, du même coup, leur accueil beaucoup plus complaisant aux influences étrangères, notamment allemandes. Le passé intellectuel de la France est romptueuse. Descartes, entre autres grands penseurs, avait par exemple, parvenu à l'idéalisme philosophique d'un nouveau fondement, en l'associant à la science moderne; la critique lucide et le matérialisme français du XVIII^e siècle marquaient la culture française d'un sceau ineffaçable, honore et admire partout.

Bien sûr, ces performances anciennes n'ont pas été unanimement reniées, de nos jours. Mais les tendances nouvelles se sont montrées plutôt oublieuses de ce passé prestigieux, ou même hostile à lui. En très peu de temps naquirent, régnèrent et moururent toutes sortes de doctrines qui prétendaient innover radicalement, qui accentuaient et cultivaient leur différence avec fureur, se combattaient violemment les unes les autres, avec véhémence. Elles s'élèvaient, chacune contre ses antécédents, dans une fiévreuse concurrence, en philosophie, en sociologie, en ethnologie, en linguistique, en psychiatrie, etc. Ce fut comme une course à l'originalité - alors qu'on se fond le propos était souvent, sous le vernis des mots, moins neuf qu'il ne le voulait, et pas si radicale la rupture...

Ainsi vit-on surgir la phénoménologie, l'existentialisme, le structuralisme, l'épistémologie, le post modernisme, à côté de la philosophie chrétienne traditionnelle et du marxisme qui poursuivaient leur propre cheminement avec des fortunes diverses.

On sait ce qu'il en est advenu. Tout cela, le temps passant, s'est vite tassé, avec peut-être la même exagération, mais en sens inverse, de mode éphémère, et le défilé incessant des modes culturels paraît facilement pour une maladie caractéristique de la France.

Puis, dans le moment actuel, toute cette effervescence s'étant provisoirement apaisée, le pays semble souffrir d'un état de manque, plus de nouveauté. Le pays attend l'apparition du nouveau héros qui réanimera témérairement, une fois

de plus la même culturelle et réveiller les acteurs de leur éthargie.

Que reste-t-il de toute cette agitation française, qui a suscité tant d'échos dans le monde ?

Les lecteurs du livre de Kha, informés précisément, et perspicaces, guissent du privilège de pouvoir assimiler et juger cette abondance de l'extérieur, objectivement. C'est en ethnologues et en sociologues de la connaissance qu'il leur faut étudier et apprécier cette ethnologie et cette sociologie, et en philosophes qu'ils doivent méditer cette philosophie - dans les normes de leur esprit chinois cultivé.

Se montrant-ils sévères ? On peut, en toute justice scientifique, l'espérer.

Mais les Français qui connaissent leurs amis chinois savent que ceux-ci voudront, avec lucidité et bienveillance, recueillir sous le décor étincelant des mots et des formules, dont les Français ont la réputation de s'enchanter trop surement, les grains de vérité et les intentions valoureuses. Saon Kha s'en fait l'intercesseur : prenez cette floraison de connaissances et de réflexions, non pas comme des idées intangibles, mais comme une sorte de matière première précieuse que vous élaborerez à votre tour. Procédez à des choix judicieux ! Faites fructifier ce qui vous semble en valoir la peine !

Que chaque nation, chaque culture rende service aux autres, par ses offrandes, à la mesure de ses moyens locaux et temporels, au rythme de l'histoire. En toute confraternité.

J. Dondt

为庆祝 2004 年中法文化交流年的到来，我将原来曾经在台北由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重新做了增订和扩充，改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简体字出版。

人类历史自从进入 21 世纪以来，社会的发展步伐令人惊异地加快。法国思想界在这短短的几年内，也同样经历了新的变化。因此，趁着这次简体字版出版的新机会，我重新补充了新的内容和资料，使本书更能切合当代法国思想界的新变化状况。

这本书从资料准备到撰写的过程，整整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我本人自 1979 年移居法国巴黎以来，经过长期耳濡目染的过程，当代法国思想和整个法兰西文化，已经潜移默化地熏染着我的心灵，成为我的生命和灵魂的一个新的重要组成部分。1989 年到台湾东吴大学任教后，我所讲授的课程，绝大部分都是围绕当代法国思想和西方文化。同时，我一直继续保持同当代法国思想家的联络和交往。每年寒暑假及休假期间，我几乎都在充满文化气息的法国土地上度过：我一方面时时访问当代著名的法国思想家，向他们请教，同他们探讨与对话；另一方面，又在法国学术界和文化媒体中，广泛收集和整理各种有关当代法国思想动态的最新研究资料。这样一来，在法国二十多年的生活和研究，以及在台湾教学期间对于法国思想的不停顿的探索过程，把我的精神生命带领到一个新的广阔境界。如果说，童年时代在印度尼西亚生活和学习期间所形成的早期心灵结构，已同青年时代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在北京大学所受到的教育及“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改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我前半生精神生命的重要思想基础的话，那么，70 年代末以来，在法国的学习、研究和生活过程，就为我原有的思想基础加入了新的更为可贵的成分，以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的精神生命获得了“重生”，进入康德所说的“成熟”阶段，从而开始具备进行自由地独立思考的能力。

康德早在 1784 年写给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ohn, 1729—1786）的信